

3

1991

WENSHIZHISHI

中华书局

文
中
古
文
藏





医药学院610 2 01479025

文史知識

1991年第3期

(总第117期)

- 治学之道 • 治学的三点感触 刘起轩 3

- 文学史百题 • “事事修饰 望之嫣然”
——南朝文学史中的陈后主 曹道衡 8

- 历史百题 • 昭武九姓及其文化东渐 王 素 13

- 怎样读 • 谈谈《骈体文钞》的编选宗旨 曹 虹 21

诗 文 欣 赏	简约	王明居	26
	一出谐趣横生的独幕诗剧 ——说汉乐府《陌上桑》	黎耕源	28
	自然之景与禅悦之情——说赵师秀的《数日》	张宏生	33
	错综用典 寄慨遥深——读元好问《洛阳》诗	魏明安	35

-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3) •
采撰的得失——如何对待历史事实 瞿林东 39

文 化 史 知 识	盟与誓——血的信仰之二	詹鄙鑫	45
	中国古代的求雨方式	张庆捷	51
	漫话闹房	曹定军	56
	古代祭祖漫谈	许永涛	59
	话说《狮舞》	王克芬	64

- 春秋季节与传统诗词 刘 畅 66
高山族洪水神话断想 尚 诚 69



人物春秋	东晋士族高门中少有的务实人物——庾翼	陈明光	72
	陈朝“一代文宗”——徐陵	陶易	77
	唐代杰出的宫廷舞蹈家——杨贵妃	李润英	83
论清代满族词坛及词作特色		张佳生	88
林纾的古文与文论		夏晓虹	92
·古代心理诗学(9)·			
拔地倚天 句句欲活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理论意义		童庆炳	97
·文史工具书介绍·尤袤与《遂初堂书目》		[香港]张克伟	103
·文学人物画廊·			
不可逃脱的悲剧命运——十二钗中话李纨		厚艳芬	106
·读书札记·杨·柳·杨柳		张先觉 鄢化志	108
青年	释“卧”	张世超	112
园地	杜牧山水诗的艺术风格	王金昌	115
·文史研究动态·			
近十多年来《史记》文学成就研究概述		俞樟华 张新科	119
·读者·作者·编者·			
谁误解了《太史公自序》一段话		王英志	125
补白 5 则 宋代妇女的冠饰与发髻(7) 唐代佛教对诗歌活动的影响(38) 夫治一国者 宜以一国为心(82) 曾国藩是否为“汉奸”(87) 牛金星的籍贯与出身(111)			
狮舞图(封二)		宋代妇女的冠饰与发髻(封三)	



治学的三点感触

刘起轩

刘起轩，1917年生于湖南安化，历任科学院南京史料处组长，中华书局编辑，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顾问。现兼日本文教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大学中国学会会员。其要著《尚书校释译论》、《禹贡地理丛考》逾六十万字尚未完稿。已出版《顾颉刚先生学述》、所录顾先生讲《春秋三传》附新撰《春秋左传学流变递嬗》、《夏本纪译注》、《尚书评述》、《尚书源流及传本考》、《尚书学史》、《古史续辨》等。

我最怯于谈“治学之道”，因为自惭治学没有得出过什么“道”。正像做文章没有依靠过什么“文章作法”一样，只是早年多读唐宋八家之文，就跟着写八家式古文，后来多读《昭明文选》，便跟着写“选体”文章，居然都有点像而已。所以总以为，如要学游泳，只有下到水里去才行，在纸上学“游泳法”是不行的。

可是在1982年时，《群众论丛》要我写写“治学经验谈”，当时也觉得自己谈不好什么治学经验，而情不可却，便只好简略地写了我一些读书经过，后来被上海《青年报》摘要转载了，1983年又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入《治学方法谈》一书中。回头再看看，自己这些摸索，对今日青年的治学并不适合，显然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

现在又承《文史知识》不弃，嘱为“治学之道”专栏写点东西，自己仍觉无新东西可写，只好就其身受及随老师顾颉刚先生治学感触最深的三点谈谈。

一、读书无捷径，全靠笨功夫

前人这方面的话是不少的，孔子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说明为学是要不停地反复地进行的。朱熹也强调对主要的书，应“从头熟读，逐字训释，逐句消详，逐段反复，虚心努力，且要晓得句下文意”。“使一书通透烂熟，都无记不起处，方可别换一书，乃为有益。若但轮流通念，而复之不精，则也未免枉费功夫”。这就是强调要下笨功夫，不要取巧、图快。所以他又说：“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也。”亦即孔子所说的“欲速则不达”。有人学习讲速成，有各种“速成法”，这些人高兴摸索这一新道路，无可厚非，每个人也有权决定采用什么学习方式。但我以为，一时图速成，最后仍不免吃亏。因为取巧图快学到的东西，往往也会很快丢掉得干干净净，这是学习心理上的一条通则吧（如用速成法突破后，能用笨功夫长期占有，或许还可以）。

至于下笨功夫啃的应是什么呢？那就是有关治学的最根本的东西。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基础课程，很多专业还有共同的基础课程，要下笨功夫啃的就是这些根本的东西。对于治中国文史之学来说，倒可以转录我在1982年写的读书经验中最后一段下列几点：（一）如果要治中国学问，一定要读先秦的典籍，因为它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的根源。掌握了它，治其后各代的中国学问就不困难。而先秦典籍到清代才作了科学的整理，因此在读原书后，也必须读清代有关著作。（二）要力求博览，但必须先熟读一两部最主要的典籍，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这恰如攻占堡垒，取得了据点，然后可以进攻退守，发展自如，也达到博与约相结合。（三）必须读整部头的原著，不要满足于后人的介绍，也不要停留于读选集，否则会始终站在门外。更重要的是，治学要像顾亭林那样，采铜于山，自加冶铸，不要取旧铜钱熔铸为新钱，甚至以旧钱充新钱。此三点外，还有打好语文基本功（包括文字学）、勤于动手及学理论诸点，也很重要，因意义显明，就不多费笔墨了。

请大家看看，一些公认的大师，哪一个不是深于先秦典籍的？（西方也一样，真正大学者是必通希腊、拉丁古典学术的）。如果不深通先秦典籍，可成为取名于一时的名学者，但不能真正成为足垂久远的大学者。至于用其它取巧方法成名者更如此。顾先生曾说：“不靠实学而靠活动和其他关系得来的有名学者，也会像司马迁说的‘当时则荣，没则已焉’。”这话真值得深思。

二、不能发现问题，就不能做学问

这句强调发现问题的话也是顾先生说的。因为发现问题，是做学问的起点。常见有人用功读了不少书，可是他没有治学的成就，原因就在他对载在书上的东西没有任何疑问，只要照着读就行了，有不明白的他也不要求弄明白。这样读书，完全白读了。可是顾先生从小读书，就由于好奇心旺盛，总喜欢寻问究竟。他说：“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象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这样在一般人见惯不怪以为当然如此的地方偏能发现问题，这就是学能有成的由来。爱因斯坦更强调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可见大科学家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点提到了多么高的高度。

上面已提到，能发现问题的关键在好奇心，亦即敏于观察。不仅顾先生如此，自然科学家李四光先生亦如此。听说他的特点是好奇心和事业心相结合，善于提出问题又善于解决问题。又爱因斯坦亦如此，他有着无休无止的好奇心，引出无休无止的问题，因心衡虑地去加以解决，就引出了他光辉的相对论学说。

三、不盲从、不拘守传统、敢疑权威

各历史时代有各自的学术传统，自战国百家争鸣，历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魏晋玄学，唐代定型的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清末今文学，五四时期所倡新文化，这些萃萃大者既形成后，都构成各时代的传统。当其兴起时，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成为僵化了的传统，不能与已前进的历史相适应，自然就要求把它突破。这种突破传统的名世之作，促成了学术的进展。而每一传统在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能产生汗牛充栋数量繁多的著作，其中绝大多数往往是困守其藩篱的平庸之作，只有少数以独立思考提出自己见解之作才能成为佳作。所以有志治学者，要从这里深所领悟对待传统应持的态度。

可以举出不少善能对待传统的显例，顾先生即是出色的一位。他说他读书、治学，都“不肯盲从他人之说”。“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我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判断”。“理性”是与迷信相对立的，由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从希腊哲学武库中找来对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作斗争的武器。顾先生正用这武器对封建史学传统展开疑辨，其目标是要“摧毁那些在……二十世纪把中国推向毁灭边缘的传统学术观点，……保留与其它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不同的文化特性”。终于对中国史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李四光也一样，他说：“不怀疑不能见真理，……不要为已成学说压倒。”他因怀疑对回龙山村石块原有的陨石说，而创获了第四纪冰川漂砾说；怀疑经典的生物地层法，创用力学分析法，而创建了地质力学。爱因斯坦在这方面更是杰出的。原先领导现代科学有过两个多世纪之久的牛顿力学，被称为经典力学，其权威被看作无可怀疑的。可是新的物理学上的发现，特别是迈克尔等欲证明牛顿所沿用的以太说的实验失败，因发现光速不变，而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在解决光的传播问题上出现矛盾。爱因斯坦根据这些，与当时不敢违异牛顿力学的学者不同，敢于以怀疑精神对待牛顿这一权威，创立了“相对论”，建立了新

的四维的时——空观和关于高速运动规律的理论，并提出量子理论以解决光电效应等，促进了现代物理学的新发展。其实牛顿力学并非陷于错误，至今仍能预测物理现象至高度的精确，能解决天文学、物理学及实用工程中的实际问题，只是其学说对物体高速运动及微观粒子等方面不能再应用。由这里更看出，对这样无可怀疑的权威，仍可不迷信它，而能提出独创性新说，就能取得大的成就。（要注意，这和故意立异做翻案文章有本质的不同。立异翻案者无是非观，无学术责任心，不是为求真，唯求诡辩取胜。）

上面说了这些，最后仍可归结到《中庸》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几句话确实深得治学之要。

（附注）：文中有些资料即转引自《治学方法谈》一书，不及详注。

宋代妇女的冠饰与发髻（封三说明）

古代妇女除了身上穿的衣裳呈现出多姿多采的风格外，头上的冠饰和发髻也是服饰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刊1989年第11期曾介绍过唐代妇女的发髻式样，这里再介绍几种宋代妇女较为流行的冠饰与发髻。

珠冠饰：用珠子装缀于冠上或缀于簪、钗、花钿间，这种冠饰在宋代贵族妇女中比较流行。宋时妇女婚嫁之时常用这种冠饰。（封三图1）

高冠、花冠：这两种冠饰都是沿袭唐、五代的时尚，到了宋代仍为妇女所喜爱。（封三图2、3）

朝天髻：宋代妇女发髻竟尚高大，尤其在北宋末年，无论宫中与民间，都流行这种发髻。为了使发髻高大，通常用他人剪下的头发加添在自己的头发中，也有制作假发髻的。宋诗中有“门前一尺春风髻”，可见其发髻之高了。（封三图4）

包髻：发髻做完后，用包绢、緞一类布帛把髻包裹起来。（封三图5）

盘福龙：这种发髻又大又扁，不妨碍睡眠，所以又叫“便睡觉”。（封三图6）

双髻：梳这种发髻多为未出嫁的少女，宋代黄庭坚诗句有“学绾双髻年纪小”即是。（封三图7）

此外还有大盘髻、小盘髻（封三图8、9）、三髻丫。（封三图10）

「事事修饰，望之嫣然」

——南朝文学史中的陈后主

• 文学史百题 •

曹道衡

陈后主陈叔宝其人的历史和后来五代南唐后主李煜颇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一个小朝廷的末代皇帝，在政治上并无建树，然而在文学上却又各自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不过历来的读者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态度颇有不同。不少人对李煜晚年的遭遇寄予较多同情，而对陈叔宝却很少道及。当然，陈叔宝的诗歌在艺术成就方面远不如李煜词，这也许是他在受到冷遇的重要原因。但平心论之，陈诗在文学史上仍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应予适当肯定。

提到陈叔宝的为人，人们常常会想起隋文帝说他“全无心肝”的话。不过，从陈叔宝一生的行事看来，他虽是一个“亡国之君”，却并不是暴君。《陈书·后主纪》对他的评语是“后主昔在储宫，早标令德，及南面继业，实允天人之望矣。至于礼乐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艺，广辟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贡者往往岁至矣”。这段话出于他的旧臣姚察之子姚思廉之手，虽有溢美，但大致总有些根据。《南史·陈本纪》则说他“因削弱之余，钟灭亡之运，刑政不树，加以荒淫”。这几句话较为公允，其实后主即位时，陈朝灭亡之势已成。至于说他荒淫，只是指他与张丽华、孔贵嫔及群臣终日饮酒作乐，荒废朝政而已。至于其他劣迹，史传似亦无记载。

陈叔宝的这种行径，是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的。陈叔宝以梁元帝承圣二年(553)生于江陵，第二年，西魏克江陵，其父陈顼(宣帝)被迁入关，他则留于穰城(今河南邓县)。这一时期，他的生活条件也许不算优越。但到陈文帝天嘉三年(562)他九岁时，陈

项从关中回建康，立他为安成王世子，过起了优裕的生活。从此直到太建十四年陈宣帝之死，他被立为皇帝止，一直像唐魏征所说：“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九岁以前的生活，对他思想的形成毕竟影响不大，长期的养尊处优，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家。

从陈叔宝当时陈代的国力而论，陈为隋灭已是必然之势。我们知道：陈代的疆域远比宋齐梁为小，长江上游的四川和中游今湖北省的大部土地早已落入北周及后来隋朝的手中。再加上陈代立国与宋齐梁三朝不同。宋齐梁三朝的皇室都出身于东晋以来的“北府兵”。这支聚居于京口（今镇江）一带的北方移民武装形成了南朝政府的武力基础。梁末的侯景之乱，粉碎了这个武装集团。陈武帝陈霸先所以能重新建立起偏安局面，靠的是他从广州一带起兵时的一支军队。单靠这支力量进行统治显然是不够的，因此陈代朝廷必须团结当时各地的地主武装进行统治。这些地方实力派往往时服时叛，朝廷也想依靠吞并他们加强自己的实力。因此在陈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本很尖锐。只是在对抗北方的北齐和北周时，才勉强团结一致。即使这样一些武装力量，陈代亦未能很好保存，而在太建十年（578）对北周的吕梁战役中，使它的主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事实上在这次战役之后，陈代灭亡已成定局，即使陈叔宝有多大才能，也已无法挽回狂澜。他的责任也许只在于他的无所作为和加速了这个过程。

陈代的衰亡其实不始于后主，在陈宣帝时，已趋向没落。《陈书·宣帝纪》称宣帝“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总《自叙》“太建之世，权移群小，谄嫉作威”；《陈书·后主纪》认为陈叔宝任用施文庆、沈客卿之流，出于“因循”，“未遑改革”可见责任不仅在他本人。当然，陈叔宝也有荒淫的一面，像大兴土木，修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每日与妃嫔群臣昏饮，甚至像《南史·陈庆之传》所载他对陈暄虐弄，都说明他是一个无聊的贵族纨绔子。至于陈死后他的沉醉于酒及向隋文帝求官，那倒可能是为自全计。对这种人物显然不值得肯定，但他在文学上

的贡献，似亦不必抹煞。

二

陈叔宝的诗歌据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共 90 余首，其中丁书所辑乐府凡 67 首，逯书比丁书多二首歌词。至于乐府以外的诗，共 29 首。乐府诗的写作年代一般不易考知，只有逯书所辑的两首歌词和丁、逯共有的《玉树后庭花》（七首）一首，可以确定为陈叔宝做皇帝以后所作。至于其他诗歌，有些因为是和陆瑜、顾野王、陆珍等人一起宴饮之作，这些人都死于陈宣帝太建时代。至于点明与“管记陆琛”、“管记陆瑜”、“詹事陆缮”等唱和之作，更说明作于即位以前。还有一首《同平南弟元日思归》，‘平南弟’指建安王陈叔卿，他在太建九年进号‘平南将军’、湘州刺史，陈叔宝即位后，改称安南将军。这里称‘平南’显然也是即位前作。这样可以确定为即位前及陈亡后之作占了一大半，可以确定为在位时作的也许只有《同江仆射游摄山栖霞寺》和《幸玄武湖饯吴兴太守任惠》。至于《戏赠沈后》一首，丁福保把它放在附录中，认为小说所载，不可信。此说大约是对的。这样看来陈叔宝在位时的作品至今流存的可能不多，大量作品可能是即位前所作。当时他身为太子，并不参预国家大事，日事宴饮作诗也未为可算什么大罪。只是由于他生活的天地过于窄小，作品内容显得贫乏，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不高。但陈叔宝毕竟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在诗歌技巧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因此他在艺术上的某些成就仍未可轻视。

陈叔宝现存的作品以乐府诗为多。这些作品中，有些颇与民歌相近，如他的《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房空帷帐轻。思君如昼烛，怀心不见明。

（其二）

自君之出矣，绿草遍阶生。思君如夜烛，垂泪著鸡鸣。

（其四）

这些诗正如清人陈祚明所说“能作新思”；“犹得《子夜》风致”。他

善于学习南方民歌，在表现妇女的细腻感情方面，能独创新意。

他的《洛阳道》写京城繁华，贵游子弟纷纷出游之状，非常逼真，可以说是反映南朝后期贵族生活的风俗画：

百尺瞰全埒，九衢通玉堂。柳花尘里暗，槐色露中光。

游侠幽并客，当垆京兆妆。向夕风烟晚，金羁满洛阳。

这种生活对陈叔宝这样的人物来说，确是很熟悉的。他在即位以前，主要就是和官僚宴饮游乐，即位以后也无非是在后庭宴饮。所以写来颇见生动。同时，他又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在遣词方面颇见功夫。如“柳花”二句，用“尘里暗”三字表现游人的众多；以“露中光”三字，显示春天清晨景色，尤为传神。

陈叔宝的乐府诗有时也善用朴素的语言表现妇女的相思之情，如《有所思》第二首：

杳杳与人期，迢迢有所思。山川千里间，风月两边时。

相对春那剧，相望景偏迟。当由分别久，梦来还自疑。

全诗几乎不用雕琢辞藻而天然亲切感人，尤其结句更显得一往情深。显然不能否认此诗为一首优秀的情歌。

陈叔宝乐府以外的诗歌，大抵是他即位前或即位后与官僚或群臣们唱和之作。他和这些官员的聚会，倒有点像当时文人的“以文会友”，并且这些诗大部分还是即位前所作。至于后来他在宫中和那些“狎客”一起作诗来称赞张丽华的作品则早已散佚。所以对这些作品似亦可作具体分析。这些诗反映的生活很狭窄，几乎很少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但在艺术上却也非一无可取。如：

殿深炎气少，日落夜风清。月小看针暗，云开见缕明。

丝调听鱼出，吹响闻蝉声。度更银烛尽，陶暑玉卮盈。星津虽可望，讵得似人情。（《七夕宴玄圃各赋五韵》）

此诗作时有顾野王在座，可证明是他即位前的作品。此诗为七夕宴乐之作，内容无甚可取。但“月小”两句写浮针乞巧的情趣极为传神，对仗工整，用字颇见精细功夫，显出作者的匠心。“丝调”二句，写当时的乐声和自然景色，亦自工细。又如他的《祓禊泛舟春日玄圃各赋七韵》：

园林多趣赏，被禊乐还寻。春池已渺漫，高枝自苁森。
日里丝光动，水中花色沈。安流浅易榜，峭壁迥难临。野莺添
管响，深岫接饶音。山远风烟丽，苔轻激浪侵。置酒来英雄，
嘉贤良所钦。

此诗究竟作于陈叔宝即位之前还是其后，难于确考。但从其他几首来推测，大约也以即位前所作较近理。此诗写春景亦颇生动。“日里”二句，体现作者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入微。“野莺”二句写自然界与游人的乐声相应和，也颇传神。“苔轻”句写景尤为工致。所以前人评此诗好句“各有生动之态”。

陈叔宝即位以后，尽管在政治上一无作为，但在诗歌创作方面仍有其贡献。如《同江仆射游摄山栖霞寺》：

时宰磻溪心，非关狎竹林。鹫岳青松绕，鸡峰白日沈。
天迥浮云细，山空明月深。摧残枯树影，零落古藤阴。霜村
夜鸟去，风路寒猿吟。自悲堪出俗，讵是欲抽簪。

此诗系和江总《入摄山栖霞寺》诗而作，当作于至德三年（585）冬①。从陈叔宝君臣这两首诗看来，虽然全作出世语，但未必说明他们真想归隐。这首诗的手法全仿谢朓，“天迥”二句写自然景色颇生动。“零落”二句写山中荒凉景色，紧接着又是“荒村”二句，点出冬景，更显出萧瑟之态。确是一首卓越的写景诗。

陈叔宝这些作品，在历来的选本中较少选录，恐怕主要是“因人废言”。只有清人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选录了他一些作品，并且评为“才情飘逸，态度便妍”，又说他诗的特色是“清丽”。同时又说“陈后主诗如徐生为容，顾步升降，事事修饰，望之嫣然，然未达礼意”。这些批评都是很中肯的，特别是指出他“如徐生为容”诸语颇形象。他认为陈叔宝诗“事事修饰”即指其作诗在修辞琢句方面处处斟酌，颇费匠心。但由于缺乏社会实践，内容往往贫乏而且有时不免雷同，并不能起到诗歌应起的作用。但即使是这种“小摆饰”式的作品，在艺术技巧方面的贡献，还是可供借鉴的。

① 江总另有《游摄山栖霞寺》诗，作于祯明元年（587）四月，当时江已为尚书令，与“仆射”官职不符，且此诗是夏初作，与“霜村”二句亦不合。

昭武九姓及其文化东渐

·历史百题·

王 素

“昭武九姓”是我国南北朝后期和隋唐时期对中亚粟特地区国家及人民的泛称。粟特地区位于药杀（今译锡尔）、乌浒（今译阿姆）两河之间，正当那密、独莫二水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皮货、香料、瓜果、葡萄酒远近闻名，一直是中亚商业贸易的中心。这里的人民，长身伟躯，深目高鼻，青眼绿瞳，皙面赤须，属亚洲亚利安种族中的伊兰种。他们能歌善舞，信仰多种宗教，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他们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通过经商，不断向中国移民。他们的文化，随着经商和移民，传播到中国各地，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化的繁荣和进步作过很大的贡献。

一、昭武九姓的由来

公元五世纪以前，粟特地区只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我国史籍称之为粟特（或作粟弋、属繇、窣利、苏哩、修利、速利）国。粟特国强盛时，势力范围曾发展到粟特地区之外。大约在451—511年间，大粟特国开始分裂，形成了许多小国家。这些小国家均以昭武为族姓，人民多以所在国的国号为姓，我国史籍称之为“昭武九姓”。据隋唐史籍，昭武九姓包括以下15个小国家：

康国——或作悉万斤、飒秣建、萨末鞬。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

安国——或作副货、忸密、捕喝、布豁。又称大安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布哈拉。

曹国——或作伽不单、劫布咀那。后称西曹。今撒马尔罕西北。

史国——或作乞史、怯沙、羯霜那。今撒马尔罕东南。

米国——或作弥末、弭秣贺。今撒马尔罕西南。

何国——或作贵霜匿、屈霜你迦。今撒马尔罕西北。

小安国——或作喝汗、喝捍。后称东安。今布哈拉东北。

东曹国——或作苏对沙那、苏都识匿、率都沙那、窣堵利瑟那。今苏联乌兹别克乌腊提尤别。

中曹国——今撒马尔罕北。

那色波国——或作那识波。“为史所役属”，又称小史。今苏联乌兹别克卡尔希。

穆国——或作木鹿。今苏联土库曼马里，或今苏联土库曼查尔朱。

漕国——或作谢飑、漕矩、漕矩吒、诃达罗支、阇乌茶婆他那。其王为“康国王之宗族”。今阿富汗加兹尼。

毕国——后作伐地、戊地。“安国统之”，又称西安。今苏联土库曼毕地。

钹汗国——或作沛汗、怖捍、破洛那、拔汗那。今苏联乌兹别克费尔干纳。

乌那曷国——今阿富汗安德胡伊。

这 15 个小国家，前 10 个为粟特地区国家，后 5 个为非粟特地区国家。粟特地区虽有 10 国，却只存在康、安、曹、史、米、何 6 个国姓。小安、东曹、中曹、那色波四国，分别为安、曹、史三国的宗族或附庸，也分别以安、曹、史为国姓。非粟特地区有 5 国，只存在穆国的穆氏一个新国姓。漕、毕二国，一为康国宗族，一为安国附庸，分别以康、安为国姓。钹汗、乌那曷二国，与漕、毕二国情况大致相似。因此，昭武十五国，其实只有 7 个国姓。15 个国家，7 个国姓，为什么要称之为“昭武九姓”呢？

我国史籍均称：昭武九姓本为“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其“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汉祁连山北确有昭武城，为张掖郡属县，故址在今甘肃张掖西北。月氏也为伊兰种，原来亦“居敦煌、祁连间”，

西汉文帝时，被匈奴冒顿、老上二单于先后攻破，才西迁葱岭之外。昭武九姓既与月氏同种，其先随月氏居昭武城，后又随月氏西迁葱岭之外，是完全可能的；其留恋故土，世代以昭武为族姓，也是符合情理的。

由于昭武十五国并不同时存在，七个国姓的统计也可能有遗漏，关于“九姓”的含义，过去大多在“九”字上做文章，如“一主九辅说”（见《隋书·康国传》）和“九个国姓说”（见《新唐书·康国传》）等。经研究考证，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实际上古人认为，“九”为至大之数。汪中《述学·释三九》云：“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昭武九姓”之“九”，就是形容昭武之国极多、国号为姓也极多。

二、昭武九姓的经商与移民

早年乌孙西迁，张骞曾向武帝建议：可厚赂乌孙，令东居故地，与汉共制匈奴。事情虽然未成，但可以肯定，故地对西迁民族是有吸引力的；河西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对昭武九姓也是有吸引力的。

据记载，昭武九姓的先辈，也就是粟特人，很早就对中国感兴趣，并经常来中国做生意。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常常把康居人和安息人误以为昭武九姓中的康国人和安国人。实际上，康居属突厥种，故地主要在药杀水东北，即今苏联吉尔吉斯境内，与康国的种族及故地完全不同。安息虽然也属伊兰种，但故地主要在乌浒河西南，即今伊朗高原，与安国的故地也有区别。历史上，粟特属于小国，为了自保，曾经臣属康居，也有可能同时还曾臣属安息，但它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与康居、安息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要严格予以区分。

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称。我国史籍称他们“善商贾”，“父子计利，财多为贵”。汉晋时期，粟特商人已结队来中国做生意。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几件粟特文文书中，有一件

约写于东汉末或西晋末的书信，详记了粟特商团以姑臧（今甘肃武威）为基地，经常派商队前往长安、洛阳、金城、淮阳、黎阳以及酒泉、敦煌做生意的情况。《魏书·粟特传》说：“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北魏克姑臧，在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九月。当时姑臧是北凉的国都。北魏六月出兵，志在消灭北凉。粟特商人面对危在旦夕的姑臧，却宁愿被俘也不愿离去，说明当时的姑臧仍是他们在中国的重要经商基地。

此后不久，粟特分裂，昭武九姓逐渐形成。隋唐时期，九姓商人又在姑臧建立了经商基地。当时做生意称作“兴生”，九姓商人常被称作“兴生胡”（简称作“兴胡”）。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很多“兴生胡”在西北边疆经商的材料。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九姓商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据《通鉴》记载，肃宗至德二载（757）正月，河西兵马使盖庭伦曾与“武威（治姑臧）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大举造反。伯希和文书2765号《大蕃勒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还记载，河西有“九姓胡军”，代宗广德二年（764），吐蕃攻武威时，曾遇到“九姓胡军”的抵抗。河西沦陷后，九姓商人又以长安为经商基地。《通鉴》代宗大历十四年（779）说：“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同书德宗建中元年（780）又说：“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前条的“商胡”即后条的“九姓胡”。此后，在我国史籍上，还能找到不少有关九姓商人在中国经商的记载。

在粟特、九姓商人来中国经商的同时，粟特、九姓人民也开始向中国移民。粟特时期数量尚小，九姓时期规模渐大。高昌、敦煌及河西是早期移民的热点。他们有的九姓同居，如吐鲁番所出《高昌昭武九姓胡人曹莫门阤等名籍》，登记46人，全为康、安、曹、何、穆等九姓胡人。有的一姓独居，如唐贞观年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在蒲昌海附近筑城，聚族而居，后来，蒲昌成为